

1930 年至 1949 年清詞的總體研究

A General Study of Ci-Poetry in Qing Dynasty from 1930 to 1949

陳水雲 (Chen Shui-yun) *

一、緒言

詞學研究經過 1919-1929 年 10 年的醞釀、積累、準備，在 1930 年以後很快進入了它繁榮發展的高峰時期，從 1930 年到 1949 年也是清詞研究取得豐碩成果的 20 年。

1930 年以後，詞學研究隊伍呈新陳代謝之勢，「體制外派」的先鋒人物胡適學術興趣轉移，不再進行詞的研究；「體制內派」的元老——況周頤、朱祖謀、鄭文焯在此前後相繼去世。但一大批詞學研究新人，在他們的影響帶動下，成為這一時期詞學研究的「生力軍」。這些「新人」，無論是「體制內派」，還是「體制外派」，都已經羽翼豐滿，從臺後走向臺前，一時間 20 世紀 30 年代的詞學研究呈現出「名家輩出」的繁榮景觀。

1933 年 4 月，《詞學季刊》創刊號上，介紹了當時南北各大學講授詞學的教授，中央大學有吳梅、汪東、王易，中山大學有陳洵，武漢大學有劉永濟，北京大學有趙萬里，杭州大學有儲皖峰，之江大學有夏承燾，河南大學有邵瑞彭、蔡楨、盧前，重慶大學有周岸登，暨南大學有龍沐勛、易韋齋，此外，還有青島山東大學的黃孝紓，上海光華大學的萬雲駿，以及在其他文化部門的鄭振鐸、胡雲翼、趙尊岳、陳乃乾、葉恭綽、夏敬觀、冒廣生，這些專家和教授以自己多年的積累，為 30 年代的詞學研究貢獻了一大批最前沿的學術成果。如《詞曲史》（王易）、《詞學通論》（吳梅）、《中

國詞史大綱》（胡雲翼）、《詞話叢編》（唐圭璋）、《清十一家詞鈔》（王煜）、《廣篋中詞》（葉恭綽）、《清名家詞》（陳乃乾）及《詞學研究小叢書》等等，還出版有專門刊發詞學論文和研究資料的學術刊物——《詞學季刊》。總之，從年譜的編纂、詞籍的搜集、文本的箋注、詞選的編印到詞史的研究，都取得了超越前代的學術成就。

1938 年以後，因為戰亂的原因，詞學研究由高峰轉入低谷，但在 1941 年創刊的《同聲月刊》，也發表了數量相當可觀的詞學論文，1946 年上海文力出版社還出版了一套 8 冊的《詞學小叢書》，但相對 30 年代的高度繁榮來說，40 年代的詞學研究已進入高潮後的平緩低落期。

二、清詞文獻的整理業績

從 1908 年到 1929 年的 20 年，嚴格意義上的清代詞選只有朱祖謀的《詞薈》和徐珂《清詞選集評》兩部，這兩部詞選完全是按照常州詞派「比興寄託」、「意內言外」的論詞標準選錄的。當時，朱祖謀曾計劃甄錄清人詞為《百家詞選》，因種種原因未能付諸行動，直到 1930 年才糾合海上詞人，倡導編纂《清詞鈔》，成立《清詞鈔》編纂處。但清代詞人衆多，詞籍浩繁，非三五年內可奏效。況且，《清詞鈔》乃大型清詞選本，要瞭解某家某派之全貌是遠遠不夠的，自清初以來，除聶先、曾王孫的《百名家詞鈔》外，再無大型清詞叢刻出現。「《四庫全書》之網羅搜訪，可謂至博；而當代詞

* 作者係武漢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研室副教授。

B3(11) 9252 22N3

950
3253
552

送檢
請上架

已建檔

集，僅收曹貞吉一家，存目亦僅七人。……夷考宋金元詞，有毛氏汲古閣刊行於前，四印、彊村、雙照復一再校輯一於後，可以無憾。毗陵趙叔雍先生，輯刻明詞，亦殺青逾半，而清詞振兩宋之墜緒，蔚成大國，獨無彙刻之者。」¹於是，陳乃乾矢志編選一部反映清詞之實績的大型叢刻——《清名家詞》，原計劃按照搜羅清詞別集的情況，擬出二刻三刻，但這一美好願望因人力、物力及時遇諸原因最終被擱置下來。

《清名家詞》選自清初李雯、吳偉業、龔鼎孳，迄於晚清況周頤、鄭文焯、王國維、朱祖謀，共 100 家，詞集計 134 種。陳乃乾自稱，在編選過程中，儘量做到「別裁版本，正訛補闕」，「一人之集，每有數刻，篇帙多寡，或不相侔，今取以互勘，俾成足本。」²是書編纂告竣，甚得詞界耆宿之好評，葉恭綽、黃孝紓等分別撰文予以表彰。葉恭綽指出，有清一代詞宗碩匠，大致無遺，是書之成，可謂「表一代之宏規，存百年之文獻。」³黃孝紓也認為，它在選人方面不及《清詞鈔》完備，然而清代詞人專集之卓然可傳者「略備於是」，「斯亦一代著作之林與風俗史也。」⁴1936年7月16日，《申報》刊文盛讚《清名家詞》之貢獻：

有清一代，詞學蔚盛，起衰振絕，追縱宋賢，詞人數以千計，詞集亦稱是，顧都為單卷孤佚，從無合刊之者。海甯陳乃乾先生，歷年搜集，都成偉觀，茲出其珍藏，輯為《清名家詞》，別裁版本，正訛補闕，苟有數刻，則取以互勘，俾成足本，並加斷句，為讀為韻，一一標明，不僅彙刻已也。學者得此一編，於一代詞學之流變起伏，必能首尾洞明，即專以刻律倚聲為業，亦灑然有矩矱在手之快矣。

誠然，作為一代詞籍叢刻，《清名家詞》也並非完美無瑕。如詞家選擇，作者聲稱以完備為標準：「僅見選本，或詩集後附刻數闕，並無別集單行者，雖佳勿

錄。」⁵這樣，便將許多無專集卻質量上乘的優秀作品排除了，還有作者的選擇亦棄置遺民、閩秀、方外，像王夫之、屈大均等遺民詞人及徐燦、顧春、吳藻等優秀作者亦排除在外，概未採錄，這就不免有遺珠之憾了。儘管這樣，其於清詞叢刻的草創之際是功不可沒的，「嗣後資力所及，遍取清人詞集，增益刊行，當以此為乘輿焉。」⁶

在陳乃乾之外，最突出的是葉恭綽的文獻整理成就，其主要貢獻是搜集、編輯、整理《廣篋中詞》和《全清詞鈔》。他在〈毛刻宋六十家詞勘誤序〉中對晚近詞學文獻整理之業績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予維校勘之學，莫盛於清。雖蠶剔爬梳，有時或嫌破碎，然有功古籍，則為事實。第所治率攻經、史、子為多，集部浩瀚，難以遍及。若夫詞，則又益未遑焉。自古微老人校刊宋元諸詞，網羅各本，字櫛而句梳之，斯道乃光大。而龍榆生之於東坡，楊鐵夫之於夢窗，則為之愈專，而效亦益著。」⁷清末民初是我國歷史上詞籍整理取得豐碩成果的一個重要時期。清末王鵬運首發其端，朱祖謀秉承其餘緒，之後整理詞學文獻蔚成風氣，先後出版有《稼軒詞疏證》（梁啟勳）、《夢窗詞全集箋釋》（楊鐵夫）、《南唐二主詞彙箋》（唐圭璋）、《淮海集箋注》（王輝增）、《東坡樂府箋》（龍榆生）等經典性的文獻整理本。但是，這些學者的文獻整理重心在唐宋詞，對明清兩代詞籍的搜集和整理關注不夠，這和大家心目中「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觀念有關，但葉恭綽卻在清詞這一為他人所忽視的領域取得了驕人的業績，他所編纂的《廣篋中詞》、《全清詞鈔》至今仍是從事清代詞學研究者必備之詞籍。

《廣篋中詞》凡四卷，上起明清之際，下迄清末民初，共選詞人 457 家，詞一千餘首。茲書仿譚獻《篋中詞》之編錄款式、體例及選錄數量，有「期成合璧」之

1 陳乃乾，〈清名家詞序例〉，《清名家詞》（上海：上海書店，1982年影印本），頁1-2。

2 陳乃乾，〈清名家詞序例〉，《清名家詞》，頁3。

3 葉恭綽，〈清名家詞序〉，《清名家詞》，頁2。

4 黃孝紓，〈清名家詞序〉，《清名家詞》，頁2。

5 陳乃乾，〈清名家詞序例〉，《清名家詞》，頁2。

6 黃孝紓，〈清名家詞序〉，《清名家詞》，頁2。

7 葉恭綽，〈毛刻宋六十家詞勘誤序〉，《矩園餘墨》（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83-84。

意，但對《篋中詞》亦有突破和超越，即是編注重光、直以還諸作家，「以補原本所未備」。夏孫桐認為，該書與《篋中詞》相比，有兩個比較明顯的優點：「復堂（譚獻）取材，半出選本，而於專集，所見未博；今則所得專集，多至倍蓰，補詞補人，庶免遺珠之憾；此一善也。復堂正集，斟酌精審，再三續補，不避重複，究涉瑣碎；今則條理貫串，首尾秩如，合成完璧之觀；此二善也。」⁸葉恭綽還仿譚獻《篋中詞》之體例，對所選之作者或詞作間下評語，有些評語頗具見識。如評清初之詞云：「清初詞派，承明末餘波，百家騰躍。雖其病為蕪穢，為纖仄，而喪亂之餘，家國文物之感，蘊發無端，笑啼非假，其才思充沛者，復以分塗奔放，各極所長。故清初諸家，實各具特色，不愧前茅，遠勝乾嘉間之庸庸淺薄陳陳相因者。」⁹但是，編者之初衷在補《篋中詞》之缺失，在體例、選量及宗旨各方面受原書之限制，葉氏後來在〈致劉天行函〉中亦談到這一點：「蓋此書一則，自始即備為譚氏之續，故不免為原書體例所拘，又采葺凡十餘年，往往作者新詞不及追列，且時人寫示所作，以其自鳴得意，難以嚴芟，而讀者見仁見智，正難相強。此亦不能盡滿人意之故也。」¹⁰

《全清詞鈔》凡20卷，所收詞人上起由明入清者，下迄由清入民國者，共3196家，8260首，是目前所見唯一之巨型清詞選本。編者聲稱其編選是書之宗旨，「意欲糾補以前各選家之缺失，成一斷代而完善之選本。」¹¹在編選採錄過程中力求擇優而從，力戒空泛浮濫；力求因詞以存人，力避因人以存詞；儘量做到客觀，力避主觀臆斷。應該說，葉恭綽在具體操作過程中是基本上做到了上述各點的，我們認為，這部巨型選本的價值還表現在它的文獻方面，它將所有入選者的姓氏、字里、仕履及相關詞學之著述作了著錄，這為清詞研究者提供了一條搜集清詞文獻的重要線索，特別是書前所列引用書目更是一篇比較重要的清詞文獻目錄。然

而，《全清詞鈔》所選也並非完美無瑕，任何一種文藝選本總是表明編選者的意見的。「葉恭綽先生在序言裏極力避免這一條，說它不是選而是鈔，但為什麼鈔這些詞，不鈔那些詞，而且在四千多人中，又選掉一千人左右，只存三千多人，這顯然有編者對於『詞』這一專門文藝的主觀認識。因此，也就對這些作家和他們的詞，作了主觀的選擇。」¹²葉恭綽的「主觀選擇」是什麼呢？錢仲聯先生的分析極有見地，即它反映的是彊村派的審美標準，葉恭綽〈致劉天行函〉中也說過，編《全清詞鈔》本擬請朱祖謀操持選政，「當時斟酌體例，煞費苦心，其定名『詞鈔』，亦系朱先生意旨」。因此，錢仲聯先生說，《全清詞鈔》「是舊時代的選本，觀點與我們有一定的距離。」¹³

葉恭綽曾有一個宏大的計畫，擬編纂「清詞四書」：《清詞存目》、《清詞選》、《全清詞鈔》及《清百家詞》，但因時間和精力之緣故，其他三書皆未見出版，實為清代詞學文獻整理工作的一大憾事。

王煜《清十一家詞鈔》是介於《清名家詞》和《全清詞鈔》之間的一部中型清詞選本，它從眾多清代詞人中選取陳維崧、朱彝尊、納蘭性德等代表性詞人11家，對每位詞人選取其有代表性的詞作：納蘭性德52首，陳維崧43首，朱彝尊41首，厲鶚40首，張惠言35首，項鴻祚45首，蔣春霖64首、文廷式37首，王鵬運44首，鄭文焯51首，朱祖謀48首，所選詞家清初3家，清中葉2家，晚清多達6家，顯然受到民國初年常州派的影響，大體上可作為瞭解清詞的普及讀本，它的價值還在編選者的序文及詞人小傳，準確地概括了清詞之流變及各家之風格。胡雲翼的《清代詞選》為其主編《詞學小叢書》之一，起自清初吳偉業、龔鼎孳、曹溶，不錄陳子龍及王夫之、金堡等遺民詞人，迄於清末王鵬運、鄭文焯、馮煦，不錄況周頤、朱祖謀、王國維等逝於民國初年詞人，凡129家，228首。這部選本較之其

8 夏孫桐，〈廣篋中詞序〉，《廣篋中詞》（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頁601。

9 葉恭綽，《廣篋中詞》，卷1，頁608。

10 葉恭綽，〈致劉天行函〉，《遐庵彙稿》（中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頁491。

11 同上註。

12 中華書局，〈全清詞鈔出版說明〉，《全清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2。

13 錢仲聯，〈清詞三百首序〉，《清詞三百首》（長沙：嶽麓書社，1992年），頁10。

他各家選本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不帶任何門戶之見，以純文學的眼光來審視清詞，既能照顧清代詞壇百派回流的客觀事實，又能突出納蘭性德（5首）、顧貞觀（4首）、朱彝尊（7首）、陳維崧（4首）、厲鶚（6首）、王策（4首）、黃景仁（4首）等人的創作成就，總體說來是一部比較優秀的清詞選本。

三、清詞的總體評價及代表性觀點

詞學文獻整理是清詞研究的基礎，清詞研究是文獻整理工作的發展和深化。1930年至1949年的20年間，對清詞的評價基本形成兩派，一派是對清詞持否定態度，代表人物是胡雲翼、謝秋萍、陳子展等；一派是對清詞持肯定態度，代表人物有葉恭綽、黃孝紓、陳乃乾、吳梅、王易等；他們分別是20年代「體制內派」與「體制外派」¹⁴的發展和延續。

對清詞持否定態度者，大多是新派學者，即「體制外派」。他們是在新文學觀念的鼓舞下進入詞學研究領域的，對歷代詞的認識深受胡適詞學思想的影響，認為詞的高峰時期在宋代，到清代已經是大勢已去。胡雲翼說：

說到詞，清詞在詞史上實被稱為詞的復興時期。……不過詞的時代早已過去了，清詞的發展只是量的擴張了。¹⁵

大多數的清詞家，不是模擬南宋，便是模擬北宋，有的擬五代，也有的擬晚唐。總之，無論他們怎樣跳來跳去，總不會跳出古人的圈套，清人的詞，因此便墮落了，走上古典主義的死路去了。¹⁶

謝秋萍也說：

到了清代，詞體又突然發展起來……乾、嘉前後，詞人輩出，錄而觀之，幾可與兩宋爭盛，但這只就

詞發展的量的一方面講的，若估其價值，則異常的使我們失望。……雖有所謂「浙派」與「常州派」之分，卻只有模擬對象之區別——前者模擬南宋，後者模擬北宋——都是在拾取宋的唾餘，毫無時代的精神表現出來。那麼，清詞雖多，亦奚以為？我們只有對著這無數的清詞人歎息，惋惜他們枉費了天才和努力，卻走入了歧路，不能造出一段值得珍貴的詞史出來。¹⁷

胡雲翼還多少承認清代是詞的「復興時期」，謝秋萍也說過清詞在量上幾可與兩宋爭盛的話，張壽林連「復興」這一點都否定掉了。他說：「許多人以為清代的詞是進化與復興，其實是退化。在清代的詞人中，想要尋出幾個有自己的靈性與作風的，真是不易。我們在陳其年、龔孝升等人的詞集中，能尋到幾首真情流露的作品？所以，清代的詞，不過是空有許多虛浮的量，而質的方面而反覺枯澀了。」¹⁸

他們對清詞全盤否定，卻對納蘭性德有相當的好評，如胡雲翼稱納蘭氏為清代第一大詞人，¹⁹張壽林也認為，在清代「有真的情緒蘊藉於他們自己的作品中的作家……不過成容若、賀雙卿三幾人而已」。可是，陳子展竟然連胡、張二氏所肯定的納蘭性德都否定掉了，他說：「詞在清代，也號稱『振衰』。元明以來，有曲無詞，詞已成了古董，雖有也沒有生氣。到了清代，又有許多第一流的文人學者注意到詞，但是他們創作的詞，可備一格而已，依然沒有生氣。便是被稱為天才的詞人如納蘭性德，成就也極有限。」²⁰與胡、張二氏相比，陳子展態度之偏激，可謂達到「苛刻」的程度。

對清詞持肯定態度者，多數是傳統型學者，即「體制內派」。他們和「清末四大家」有著直接或間接的淵源關係，對清詞的看法基本接受「清末四大家」的意見，即詞到清代是「中興」、「光大」、「繁榮」時

14 胡明，〈一百年來的詞學研究：詮釋與思考〉，《文學遺產》，1998年第2期，頁16-29。

15 胡雲翼，《新著中國文學史》（上海：大東書局，1937年），頁268。

16 胡雲翼，《中國詞史略》（上海：大東書局，1933年），頁215。

17 謝秋萍，〈吳藻女士的詞〉，《吳藻詞》（上海：文力出版社，1947年），頁1-2。

18 張壽林，〈賀雙卿〉，《晨報副刊》第52期（1926年1月21日），頁39。

19 胡雲翼，《新著中國文學史》，頁271。

20 陳子展，《中國文學史講話》（下）（上海：北新書局，1937年），頁336-337。

期。1934年，龍榆生在其所著《中國韻文史》第二十三章中專論「清詞之復盛」：

清代二百八十年，詞人輩出，超軼元明二代，駸駸與兩宋比隆。雖此體不復重被管弦，僅為「長短不葺之詩」；而一時文人精力所寄，用心益密，托體日尊；向所卑為「小道」之詞，至是儼然上附《風》《騷》之列；而浙常二派，又各開法門，遞主詞壇，風靡一世。吾輩撇開音樂關係，以論清詞，則實有同於唐人之新樂府詩，於中國文學史上，佔有極重要之地位焉。²¹

1936年，陳乃乾《清名家詞》的出版，引起了許多學者評論研究清詞的熱情，葉恭綽、黃孝紓、趙尊岳、陳運彰等為之作序題辭。陳乃乾序例謂：「清代三百年間，問學之業絕盛，經史辭章，遠邁前代，詞亦勃然中興。」趙尊岳題辭稱：「有清一代，詞學蔚盛，浙西導其先河，吾鄉尊其宗緒，上追天水，遠軼朱明，策《蘭畹》於來茲，勵《金荃》於前躅，為承學右文之士所不可不潛研探討者也。」夏白蕉題辭則稱：「清代學術蔚盛，度越前修，詞亦其一，清空婉約，深宏柔厚。浙西、常州兩派，前後倡導，各標宗尚，而探其源流正變，以氏於大成。」葉恭綽序稱：「余嘗論清代學術，有數事超軼明代，而詞居其一。蓋詞學濫觴於唐，滋衍於五代，極於宋而剝於明。至清，乃復興……斯不可不謂之極盛也已。」²²他們或稱清詞「遠邁前代」、「上追天水，遠軼朱明」，或謂詞至清代「氏於大成」、「謂之極盛」，這都是承認清代乃詞的「中興」、「光大」時期。

不過，也不是所有的新派學者皆對清詞持否定態度，如屬於新派學者的蘇雪林，便對清詞的成就擊節讚歎。她說：

有清一代學術最為發達，而詞的造詣尤為卓絕。……清代不但文學家無不工詞，即那些嚴義正氣的理學名儒，究心康時經世之用的廟堂大臣，也有一

二卷小詞流傳於世。所以清代詞人之多，詞集之富，實為前代之所罕見。而且個人創作的量數也著實可驚……其他詞話詞評之作，亦復颯起雲湧，盛極一時。如說兩宋是詞的黃金時代，那麼清代可說是詞的第二黃金時代。這好像花卉一般，春天的花嫣紅姹紫，馥鬱芬芳，一陣陣爭奇鬥豔，一番番立異標新，我們以為天地的元氣已發洩盡了，造化的匠心已精巧到無以復加了，但經過炎長的夏季之後，來了溫和的秋天，於是自然界又有一番絢爛的表現。論者謂詞到清代，可謂為貞元絕續之交，洵為不誣。²³

以清代為詞的第二個黃金時代，比清代為詞的秋天，是詞的收穫季節，實在是符合詞史的合理論斷，也說明蘇雪林眼光的敏銳性。同樣地，也不是所有的傳統型學者對清詞持肯定態度，如治學路數屬於傳統型學者的夏敬觀，對清詞亦多所貶抑之詞。1935年，他為葉恭綽的《廣篋中詞》所撰序文謂：「嘉、道前，詞人大抵祖禰陳維崧、朱彝尊、厲鶚、郭麐，豪者稱蘇、辛，清婉者稱白石、梅溪、玉田、碧山而已。……顧二百年來所薰習濡染，莫能盡滌，譚氏（獻）於《詞辨》有評，輯《篋中詞》，剖析精微，議論洽當，至其自為詞則結習仍所不免。」²⁴他不滿清初陳、朱兩家及清中葉的浙派詞人厲鶚、郭麐，甚至連當時大多數學者極力褒揚的常州派都否定掉了，觀點的確有些偏激，個人好惡的感情色彩太濃。不過也可看出，對清詞的評價，乃見仁見智之事，是難以學派的觀念所界定的。

平心而論，胡適、張壽林、陳子展之論未免有些偏激，清詞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當可稱之「中興時代」，劉麟生說：「清代的詞……比較宋人詞，當然不及他們的雄深，可是比較明人詞，雅正得多了，就是拿元人詞來比較，也覺得富於變化咧。」²⁵進入40年代後，即使是「體制外派」，在評價清詞的價值時，亦漸以表現

21 龍榆生，《中國韻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39。

22 陳乃乾，《清名家詞》，卷首，無頁碼。

23 蘇雪林，〈清代女詞人顧太清〉，《婦女雜誌》，第17卷第7號（1931年7月），頁25。

24 夏敬觀，〈廣篋中詞序〉，《廣篋中詞》，頁602。

25 劉麟生，《中國詩詞概論》（上海：世界書局，1936年），頁83。

出一種平和、慎重和冷靜的態度，在指出清詞缺點的同時也肯定其成就。如趙景深說：「清代詞號稱中興，遠較元、明為發揚光大。」²⁶胡雲翼也改變了他初期徹底否定清詞的態度，認為清代在千年詞發展史還是可以稱之為詞的「中興時代」。「詞至清代，雖不能說是黃金時期，然此三百年中詞的量的發展，則兩宋視之亦瞠乎其後。論者至謂清詞人有四千之多。此雖非精密統計之結果，然清詞之盛，實令人歎觀止也。」²⁷劉大杰更說：「詞在清代二百餘年中，其發展的過程，雖與詩文同樣是走的復古擬古的路，但其成就，確在詩文之上。我們現在細讀清人的作品，知道他們對於詞的製作，對於詞的中興運動，實在是盡了很大的心力，無論審音守律，修辭用字，都非常認真，態度的嚴肅，遠非明人可比。……從晚唐發展起來的詞，到了清朝，經過多少作家的最後努力，作了一個光榮的結束。」²⁸他們在肯定之中有否定，承認成就也指出缺陷，體現了一種文學研究者的歷史意識，這是文學史研究者對清詞認識逐步深化的一個具體表現。

四、清詞中興及其原因的分析

從上述分析可知，無論是肯定清詞和否定清詞者，一般地都認定清代是詞的「光大」、「中興」時代，對於「清詞中興」的具體表現，大多數學者是從清詞「數量」超過宋元去認識的，但具體說來在「數量」的那些方面超過宋元，論者往往言之不詳，談得比較全面的當推《全清詞鈔》的編纂者——葉恭綽。

葉恭綽從開始編纂《全清詞鈔》起，到1930年已搜集到清代詞家4850餘人，然後將搜羅到的詞家從地域和時代縱橫兩個方面進行了量的統計和分析。從地域的方面看，江浙地區的詞家明顯多於西部地區，江蘇2009人，浙江1248人，安徽200人，廣東159人，福建

87人，江西71人……，而西部的陝西、甘肅、新疆人數極少或完全空白。葉恭綽分析說：「觀於上表所列，可知江浙文化之盛，亦可知揚子江流域，文化傳播來得容易，安徽居第三位，亦因揚子江之流域灌溉較易之故。廣東是屬於珠江流域，江西和四川，也是為著長江的關係……最少是甘肅、蒙古兩地，與江浙比較，相差到數十部。可知詞之發達與否，與文化學術適成正比例。」²⁹從朝代的變遷看，清詞的發展走向是越到後期作者越來越多，順治朝188人，康熙朝117人，雍正朝36人，乾隆朝362人，嘉慶朝328人，道光朝440人，咸豐朝202人，同治朝110人，光緒朝178人，宣統朝132人。「在此表上看出，道光朝詞人最多，頗足怪異。據我的理想，或者為承常州詞派盛興之後，風氣大開的緣故。」³⁰葉恭綽從地緣文化和文學流派興盛的角度談清詞中興之原因，的確是切中肯綮之言。最後，他總結說，清朝詞人實際超過6000餘人，別說元明，即是宋代也不及此數，當然這並不排除年代久遠，有些作者漸以湮沒的歷史原因，但從趙尊嶽所輯明詞的數量和質量看，清代詞學是比較興盛的，這是不爭的歷史事實。

清詞數量超過宋元是毫無疑義的，但清詞的「質量」是否超過宋元，或者說是否有自己的創作特色呢？葉恭綽給予了肯定性的回答，他認為清詞之所以說它超越明代、上接宋元，是因為它有兩個優點：一是托體尊，二是審律嚴，這兩個優點實即清代詞學的兩大成就。從尊體的角度看，在這之前，詞往往被視作一種遊戲，從五代歐陽炯到宋初晏殊、陳世修、歐陽修都是以詞為「小道」、「末技」的，大多寫些流連光景的話，而且多傷於率野，無深厚之情緒及高遠之理致。「元人也多是如此，而且多流入纖碎一路，及至明代，連詞的體質多未辨清。他們的詞，往往不是浮麗纖巧，就是粗獷叫囂。」³¹葉恭綽認為，朱彝尊有感於詞學

26 趙景深，《中國文學史新編》（上海：北新書局，1947年），頁324。

27 胡雲翼，〈清代詞選題記〉，《清代詞選》（上海：文力出版社，1947年），頁1-2。

28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達史》（臺北：中正書局，1980年重印本），頁324。

29 葉恭綽，〈清代詞學之攝影〉，《遐庵彙稿》（下編），頁81。

30 葉恭綽，〈清代詞學之攝影〉，《遐庵彙稿》（下編），頁82。

31 同上註。

「日見頹靡」，便想方設法挽救，「標出宗旨，汰去不少惡習，漸將詞的品格提高，於是詞學漸漸走上正軌」。嘉慶、道光時期，張惠言、周濟又有感於浙派專於文字上做功夫，「磨礪雕琢，遺神襲貌」，主張詞上接《風》、《騷》，這樣詞的風氣再次發生轉變。到光緒間，浙、常兩派均由盛轉衰，桂派領袖王鵬運、況周頤，以常州派為根柢，又稍加變化，因之詞風復又一變。「清詞共有三變，而其不謀而合的，卻同是提高風格，增進詞的地位。」³²從守律的角度看，詞原本是一種配樂演唱的音樂文學，在南宋以後因樂譜失傳，有些「聲調妍雅」的歌曲已不能倚聲而歌了，許多填詞者在創作的時候也不太注重詞的音樂性。元明時期是戲曲繁榮發達的時代，以曲為詞、詞曲不分的現象越來越突出。餘風未泯，波及清初，順治、康熙兩朝以曲為詞、不合詞律者甚眾。萬樹說：「乃今泛泛之流，別有超超之論。謂詞以琢辭見妙，煉句稱工，但求選豔而披華，可使驚新而賞異，奚必斤斤於句讀之末，瑣瑣於平仄之微。」³³於是，有識者起而編《詞律》，訂《詞韻》，審聲守律，出現了萬樹的《詞律》和戈載的《詞林正韻》這樣代表清代詞學在格律用韻方面最高成就之著作，詞譜詞韻的編訂和清代詞壇對不守聲律現象的大勢討伐，引導著填詞者兢兢於守律審聲，所以清詞大家是很少不合律的，不但講究平仄，即四聲陰陽亦不容混，「這是清詞的獨優之點」，亦是清詞中興的重要業績。

雖然如此，「體制外派」與「體制內派」在這方面是存在著分歧的，這也是決定他們對清詞總體評價的「焦點」。「體制外派」認為，詞的時代已經過去，清詞不是模擬南宋，就是效法北宋，逃不出「古人」的範圍。「體制內派」認為，詞在清代雖不及兩宋，然而清詞亦有自身的特點，葉恭綽所言「托尊體」、「審律嚴」即是其表現，但葉氏所論過於簡略。張爾田〈彊村遺書序〉中將清詞的成就概括為四點：一曰守律、二曰審音、三曰尊體、四曰校勘。序謂：

勝朝沿胡元餘習，淫哇塞聰，知曲而不知詞。楊升庵輩又臆造為自度之腔，破規偈律，益紊變而不可

紀。萬紅友氏起，審於五要，精於四上，取宋賢樂句節度而刊比之，標《尊前》之逸唱，正《嘯餘》之妄作，而後倚聲者人知守律。是為詞學之一盛。……天水末葉，無名氏著《茶蘼軒詞韻》，以入聲分配三聲，論者謂其專為北曲而設，胡文煥、沈去矜、程名世諸人承之，向壁虛造，迷誤伶倫，詞之雜流，由斯而作。戈順卿氏起，辭而辟之，知詞有異曲之部，則稽之《混成》遺譜，知詞有隨律之聲，則本之守齋緒言，通轉之例必嚴，腹舌之諧期准，而後倚聲者人知審音。是為詞學之再盛。方是時也，家家自以為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然而真宰弗存，鄭聲逐競，登山臨水，義不軌夫樂哀；充箱照乘，辭惟陳夫鳥履，洵有如金應珪氏所譏之「三蔽」者。張皋文氏起，原詩人忠愛悱惻、不淫不傷之旨，《國風》十五導其歸，《離騷》廿五表其絜，剪隨孔翠，澡淪性靈，崇比興，區正變，而後倚聲者人知尊體。是為詞學之三盛。……蓋自王佑遐之校夢窗，敘述五例，以程已能，（彊村）先生循之，津途益辟，是故樂府之有先生，而後校讎乃有專家，下與陳、晁競爽，上與向、歆比隆，六義附庸，蔚為大國，遂使聲律小道，高躋乎古著作之林，與三百年樸學大師，相揖讓乎尊俎之間，在於三累之上。嗚呼，可謂詞學之極盛已！

與張爾田僅僅著眼於清詞成就不同，王佳洪〈清代詞學〉一文既提優點也講缺點，比較全面地總結了清詞之成就及特色。他說：「詞至宋末，已不復被管弦，歷元明而衰蔽幾絕。清代諸家出，始崇意格，沿宋人之格律，為長短不葢之詩，抒寫其性情抱負，雖不被管弦，要亦不失為文學妙品也。」³⁴然後，他將清詞之特色概括為五個方面：（甲）擅音律。清人詞雖不復重被管弦，亦不違宋人法度。且窮究律呂，務無乖於音樂之道，以視明人之荒疏率意，非可同日而語也。（乙）尊詞體。張惠言以經學大師，倡意內言外之說，儕之風雅，詞體遂尊，乾嘉以來，論詞者皆准張氏之說，故不復有小道之譏矣。（丙）精藻鑿。清人之詞學評論，可

32 葉恭綽，〈清代詞學之攝影〉，《遐庵彙稿》（下編），頁83。

33 萬樹，〈詞律自序〉，《詞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1。

34 王佳洪，〈清代詞學〉，《女師學院期刊》，第4卷第12期（1936年6月），頁4。

謂前無古人。如浙派之於南宋，常州派之於北宋，各舉標榜，皆具只眼；其見地特高，影響特大者，當推周濟、況蕙風、王國維三人。（丁）明校勘。清代校勘之學極盛，至清末詞學亦尚整理和校勘，開風氣之先者為臨桂王鵬運，至朱祖謀而校勘益精，所刻《彊村叢書》：「於宮調旁譜，皆精心校注，且又多善本參考……可為盡美盡善矣。」（戊）尚模仿。詞至兩宋已至極頂，清代詞人，雖聰明人力，視前人無遜色，然詞之精蘊，已為前人道盡，遠不得不落入模仿之途，這是時代及文體發展之趨勢耳。這些特點，有些是優點，有些卻是缺點，有些是從創作言的，有些是從理論言的，有些是別人談過的，有些則是作者的獨到認識，但它較之其他論者要全面、深刻、細緻。

「清詞中興」的具體表現，既如上述，那麼「清詞中興」的原因何在？這是許多學者關心和反復討論的話題。王煜從文學與時代關係的角度，探討了清代實行政治高壓的政策，反倒促成了清詞創作的繁榮和復興。他說：「至於清，異族多猜，疊興文獄，才人學士，既不以科舉熱中，復不敢言辭賈禍，斂形遠害，群遜於樸實艱僻之途。是以考據箋疏，至茲特大。詞本倚聲，較難馳騁，幽微要渺，可托孤憤。國初諸賢致力於此者，蓋欲消磨豪邁，自忘天下，固不徒寄感興亡之際也。……洎乎國削政衰，志士滋南渡之感；祚移命改，耆宿以宋遺自悲，每托倚聲，致其淒哽，言成血淚，文益炳烺。」³⁵ 王易還認為，清代詞學的振興，與清代學風的轉移和帝王的愛好提倡有關。從學風轉變看，明代學風浮藻，「淺學者懷微幸弋名之志，高才者生驕矜自滿之心」，「於是浪蕊浮華，競其藻采；巧偽小智，弄其玄虛」。在清代樸學大盛，「流風所被，朝氣所驅，俾知名非浪得，學必探源，雖在填詞度曲之微，亦有厚薄深淺之等；遂乃各植根柢，務造精深。淺學者不足以成名；高才者無所用其滿。稽其所詣，洵足以振明代之衰，而發詞林之暗矣。」³⁶ 從帝王的提倡看，「清初風雅之突勝於明者，亦係夫君主之好尚，遠過於明之諸

宗。觀世祖之於尤侗，聖祖之於姜宸英，世宗之於閻若璩，高宗之於沈德潛，或誦其文，或耳其名，或欽其學，或愛其詩，皆以特識殊遇，拔自寒微；開館編書，成就豐大。由是士有所勵，不敢自菲，奮而益勤。故自康熙至乾隆間，詞之作家固遠過明代，即詞學之著述亦較明為優。」³⁷ 王洪佳在〈清代詞學〉一文，又指明清代詞學復興的原因有四個方面：（一）世運太平與君主之提倡；（二）學術潮流之影響；（三）詞學演變之自然趨勢；（四）詞學專家及詞學系統之建立。第一、二點已為王煜、王易所揭示，第三、四點是王洪佳的獨到發現。他認為：「文學史之時代，時呈曲線之態，衰而復始，修正其蔽端，而更張旗鼓之情形，於詩文皆非一見矣。……詞至清而大興，修正明詞之蔽，而為宋之後繼者，蓋自然之勢也。」這是說清詞復興為其發展的自然趨勢，至於清詞專家，則如納蘭容若、蔣春霖、項廷紀「生平別無所聞，惟詞獨橫絕一代」。朱彝尊、厲鶚雖說詩曲皆工，然其最大之成就仍在詞，王鵬運、朱祖謀、況周頤、鄭文焯等，更是將畢生心力傾注於詞。「專家既如此之多，宜乎詞學能振衰起病、蔚然而盛也。」還有，清詞之興盛在其能建立詞統。浙派以清空婉約為宗，標舉白石、玉田，造成「家白石而戶玉田」之詞風；常州派標舉柔厚之旨，以北宋之深美宏約為歸，造成比興柔厚之宗尚。除個別天才外，清代三千詞人，大都未能越出二派之範圍。「要之，清代詞風之盛，其最大原因有二：一以其有專家之努力，一即浙派及常州派倡導之功也。」³⁸ 這些看法，對今天的研究者來說，仍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舊說重提對學術研究而言並不是過時的話題。

五、清詞分期的界定及詞風嬗變的研究

歷時 268 年的清詞，流派紛呈，詞風更迭，頭緒繁複，如何清晰地掌握清詞發展變化的規律呢？劃分清詞發展之時段，確定清代詞風轉變之關捩，是擺在

35 王煜，〈清十一家詞鈔序〉，《清十一家詞鈔》（南京：正中書局，1936 年版），頁 1。

36 王易，《詞曲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年），頁 380。

37 王易，《詞曲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年），頁 380。

38 王洪佳，〈清代詞學〉，《女師學院期刊》，第 4 卷第 12 期（1936 年 6 月），頁 2-3。

研究者面前的首要任務。在晚清時期曾有張德瀛的「三變說」及譚獻的「前十家」、「後十家」之說，到民國19年（1930），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分清詞為清初、乾隆以前、嘉慶以來三個階段說，但這些說法都過於簡略，未能全面概括及描述清詞發展之脈絡。

1930年，葉恭綽為暨南大學師生作〈清代詞學之攝影〉的演講，曾提出著名的「三變說」，即從清初到朱彝尊是一變；從浙派到張惠言是一變；光緒年間浙、常兩派均由盛轉衰，以王鵬運、況周頤為代表的臨桂派崛起，詞風復又一變。這是把詞風轉變與流派更迭結合起來討論，注意到詞史發展過程中關鍵性環節，將清詞置於運動變化中考察，試圖弄清清詞三個時期的階段性特徵。但這一分期有些簡略，時間斷限亦不甚明確，同年，王易所撰《詞曲史》一書，也將清詞劃分為清初、中葉、晚清三個時期。清初斷限劃在康熙末年，清中葉則主要指雍正、乾隆、道光中三個時段，晚清指鴉片戰爭特別是太平天國起義以後的六十年。納入清初論述的詞人，以孫默《十六家詞》、聶先、曾王孫《百名家詞》所列為準，包括吳偉業、龔鼎孳、曹溶、王士禎及納蘭性德，浙西派詞人，陽羨詞人；納入清中葉論述的詞人，有宗朱者如厲鶚、吳錫麒、王昶等，宗陳者如楊芳燦、洪亮吉、黃景仁等，以及新起的常州派詞人，如張惠言、董士錫、周濟等，還有不為常州派所牢籠的周之琦、項鴻祚、凌廷堪、戈載等；晚清則以蔣春霖為代表，還有譚獻、黃燮清、杜文瀾、莊棫等詞家；還有同光以後的湖湘詞人、江浙詞人、閩粵詞人和「清末四大家」。王易的劃分比較細緻，兼顧詞派的流變，更重視時間的橫斷面，即不同詞派共存於同一時間段內，較之錢基博的「三期說」和葉恭綽的「三變說」更為合理也更具有科學性。

1933年，吳梅在自己多年教學基礎上，撰寫的《詞學通論》一書，根據清代詞風的變化，按清詞發展的脈絡，把清代的詞史分為「四個時期」。他說：

蓋嘗總而論之，清初輦轂諸公，尊前酒邊，借長短句以吐其胸中之氣。始而微有寄託，久則務為諧謔。……漁洋（王士禎）數載廣陵，實為此道總

持。迨納蘭容若才華門地，直欲牢籠一世。享年不永，同聲悲惋，此一時也。竹垞（朱彝尊）以出類之才，平生宗尚，獨在樂笑。……李李（李良年、李符）繼軌，更暢宗風。又得太鴻（厲鶚）羽翼，如萬花穀中，雜以芳杜。揚州二馬（馬日瑄、馬日璐），太倉諸王（王時翔、王策等），具臻妙品……此一時也。自樊榭之學盛行，一時作家，咸思拔軼於陳朱之外。又遇大力者，負之以趨，窮幽幽深，詞格又非昔比。武進張氏，別具論古之懷，大汰言情之作，詞非寄託不入。皋文（張惠言）已揭槩於前，言非宛轉不工，子遠又聯驂於後，而黃仲則、左仲甫、惲子居、張翰風輩，操翰鑄辭，絕無鉅釘之習。又有介存周子（濟），接武毗陵，標趙宋為四家，合諸宗於一軌……此一時也。洪楊之亂，民苦鋒鏑，水雲（蔣春霖）一卷，頗多傷亂之語。以南宋之規模，寫江東之兵革。……復堂（譚獻）雅制，品骨高騫……開比興之端，結浙中之局。禮義不愆，根抵具在。月坡（孫麟趾）、樵風（鄭文焯），無所不賅，持較半塘（王鵬運），未云才弱，其精到之處，雅近玉田。而茗雅（王國維）一卷，又有狡童離黍之悲焉，此又一時也。³⁹

吳梅的「四期說」注意到不同時期詞風的嬗變，特地將清初一段獨立出來，又尤其重視浙派朱彝尊與厲鶚之間的連續性，以及浙派與常州派審美主張的差異性，這種將浙派詞人厲鶚與常州派劃分為兩個階段的做法，較之王易又要前進一步，如果說王易還只是將分散的詞人劃入不同時期的話，那麼吳梅則看到了處在同一時間段內不同詞人詞派的內在聯繫和某些時代特徵。應該特別提出的是，儘管他將清代主要詞家詞派納入到不同的時期進行討論，但是忽略了清初一個極其重要且甚有影響的詞派——陽羨派，這是失誤。

在吳梅之後，即1936年，王洪佳和葉恭綽亦提出「四期說」，王洪佳是從詞派詞風嬗變的角度來劃分的，同時還考慮到不同時期詞學的特徵。第一期：自滿清入主，到康熙初期，共40餘年。此期作者，悉明之遺老，各家詞鈔所刻，在百家以上，已開有清一代風氣。第二期：自康熙中，迄於嘉慶之初，浙派全盛時

39 吳梅，《詞學通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152-153。

期，實開清詞一代之門徑。第三期，乾嘉道光之間，為常州派全盛時期。第四期：道光同治以迄民國，清代詞之光榮結局時期。數十年間，詞家輩出，詞風特盛，批評、校勘、聲律之學皆臻極，「蓋為本期乃集一代之大成者也。」⁴⁰葉恭綽的「四期說」，不同於他早年的三變說，也迥異於吳梅、王洪佳著眼於詞風的嬗變和詞派的更迭，而是從「清詞中興」的角度描述清詞的發展軌迹。他說：「蓋詞學濫觴於唐，滋衍於五代，極於宋，而剝於明，至清，乃復興。朱、陳導其流，沈、厲振其波，二張、周、譚尊其體，王、文、鄭、朱續其緒。二百八十年中，高才輩出，異曲同工，並軌揚芬，標新領異。迄於易代，猶倚餘霞，今之作者，固強半在同、光、宣諸名家籠罩中。斯不可不謂之極盛也已。」⁴¹他在時段的界定上與吳梅的「四期說」大致吻合，但立論的基點卻是清詞復興之過程——「導流」、「揚波」、「尊體」、「續緒」。這一作法與他對清詞的總體認識密切相關，即要揭示清詞中興的盛衰變化之規律，他編纂《全清詞鈔》的一個重要目標，也是要把有清一代作家的作風和流派的轉變，於每一時期傑出和流行作品中能表現其迹象。從葉恭綽對清詞盛衰之原因的分析看，見解是相當精闢的，很多看法至今依然是無法更易的經典之論。

考察上述研究者對清詞流變的描述，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清詞三大流派（浙派、常州派、臨桂派）是劃分斷限的重要參照系。如 1936 年似慈分清詞

為三期，即以浙派為第一期，常州派為第二期，清末四大家為第三期。直到 1940-1941 年，蔡楨還堅持清詞「三期」說，他立論的視點便是流派的盛衰更迭。他說：

清詞派別，可分三期。浙西派與陽羨派同時。浙西派倡自朱竹垞，曹升六、徐電發等繼之，崇尚姜、張，以雅正為歸。陽羨派倡自陳迦陵，吳蘭次、萬紅友等繼之，效法蘇、辛，惟才氣是尚，此第一期也。常州派倡自張臯文，董晉卿、周介存等繼之，一振北宋名家之緒，以立意為本，以葉律為末，此第二期也。第三期詞派，創自王半塘，葉遐庵戲呼為桂派，予亦姑以桂派名之，和之者有鄭叔問、況蕙風、朱彊村等，本張臯文意內言外之旨，參以凌次仲、戈順卿審音持律之說，而益發揮光大之。此派最晚出，以立意為體，故詞格頗高。以守律為用，故詞法頗嚴，今世詞學正宗，惟有此派。⁴²

蔡楨的「三期說」，既考察到流派的更迭，也注意到時序的推進，應該說是比較合理的分期法，但是，他將第一期、第二期的斷限，劃在張惠言出現的乾隆末年，時間跨度約有 150 年，未免有些不合情理。另外，這一分期也過於簡略，許多清代重要詞家，沒有形成流派者如納蘭性德、項廷紀、蔣春霖等未能進行討論，這是他的不足，認識有進一步深化的必要。

綜而論之，各家分期標準不同，分期斷限存在差異

分期 \ 年代	順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慶	道光	咸豐	同治	光緒	宣統	
錢基博「三期說」	前期		中期		後期						
葉恭綽「三變說」	前期				中期			後期			
王 易「三期說」	前期		中期				後期				
吳 梅「四期說」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王洪佳「四期說」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葉恭綽「四期說」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似 慈「三期說」	前期（浙派）				中期（常州派）			後期（清末四家）			
蔡 楨「三期說」	前期（浙派）				中期（常州派）			後期（臨桂派）			

40 王洪佳，〈清代詞學〉，《女師學院期刊》，第 4 卷第 12 期（1936 年 6 月），頁 7-9。

41 葉恭綽，〈清名家詞序〉，《清名家詞》（上海：上海書店，1985 年），頁 1。

42 蔡楨，〈柯亭詞論〉，《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4908。

在所難免，但也由此考見清代詞風變化之軌迹。茲將各家分期列表如下：

分期研究的根本目的，一方面是爲了弄清詞史發展規律，另一方面也是爲了辨析每一時期的創作特徵，這也是這一時期清詞研究取得重大收穫的部分。如王洪佳〈清代詞學〉一文，在描述了清詞發展脈絡後，對前後四個時期的創作特徵作了總結性的論述：

第一期第二期，乃自五代北宋，而趨南宋。第三期第四期，又自南宋，而上追北宋。初期雖以《花間》《草堂》爲宗，而以才力勝，模仿尚非專藝，門戶並未確立。至於浙派，則偏主南宋，常州派則專主比興，各走極端，互見短長；而五百年來詞壇，經兩派之提倡，爲體乃尊……末期則貫穿兩宋，融洽諸家，而集一代之大成。創作之風既盛，研究之學益精，是詞史之一大結束也。⁴³

這裏提出的觀點是頗有新意的，可以見出清詞發展變化走向，但由於論文篇幅所限，王洪佳未能對他的觀點展開作更詳盡的論述，而對清詞階段性特徵論述頗多且具體而深入的當推葉恭綽。首先，他闡述了自己對清詞不同時期創作的觀點，這就是：順、康初期猶襲明風，康、雍力追宋軌，乾隆初、中葉漸入庸濫，乾隆末葉及嘉慶時另辟途徑。接著他對上述觀點作了一個詳細的分析和表述。第一期，即順治和康熙初期，總體上是沿明末之餘習，其間雖雜以興亡離亂之感，而且有些作品「情韻特深，才氣橫溢」，但是其流弊則爲纖仄爲蕪濫。第二期是浙西詞派的出現，它是要挽救清初之弊，「救之以清雅，斂才就範」。然而浙派末流又往往流爲餽釘與膚廓，其突出表現是標南宋爲宗，往往爲琢句遣詞，墮入宋詞話所謂「詞眼」窠臼，對胸襟、意境、氣韻、骨力皆不注重。「自是以後，傳爲衣鉢。僅得糟粕、門面。降至乾隆中葉，頹靡更甚，一片荒蕪。」第三期，即乾、嘉之際，張惠言、周濟、龔自珍等倡導「意內言外」之論，「力尊詞體，探源《詩》《騷》，推崇比、興」。於是，論詞者逐漸明白詩和詞係一貫的東西，不是過去人們所理解的那樣爲詩之「餘緒」，它可以與《詩三百》、楚辭、樂府及南北曲、雜劇等聲歌

韻語融爲一體。「詞之領域愈廓，包孕亦愈宏深。其所見，殆出宋、元之上矣。」爲什麼在乾、嘉之際詞壇會出現這一轉機呢？葉恭綽分析說，是因爲其時清朝的統治已盛極而衰，對社會的各種控制逐漸廢弛，知識界及文藝界的思想亦逐漸趨於解放。因此，在嘉慶、道光兩朝政治、外交、軍事走下坡路的時期，反而在文藝界裏爆發出耀眼的光芒和活力。第四期在鴉片戰爭之後，這時知識群體接觸社會面越來越廣，外在事物與情感之刺激也越來越多樣化。「其表現於文藝者，自亦更不相同。所以，這階段的詞，亦更形光輝燦爛。」⁴⁴

六、清詞流派的宏觀審視與「新」「舊」兩派的學術立場

清詞中興的一個重要表徵是流派衆多，從清初的雲間、西泠、柳洲、廣陵、陽羨諸詞派，到中後期影響較大的有浙派、常州派、臨桂派，其中影響深遠的當推浙派和常州派了。因此，對浙派和常州派的研究，便成爲這一時期清詞研究的重中之「重」。這一時期發表了五篇有代表性的研究論文，它們是劉宣閣的〈浙派詞與常州派詞〉、任二北的〈常州詞派之流變是非〉，陸樹柷的〈道咸以來的江浙詞風〉及龍榆生的〈論常州詞派〉、〈晚近詞風之轉變〉，許多文學史著作對浙派和常州詞派也進行了系統地評述。

陸樹柷〈道咸以來的江蘇浙詞風〉一文（《江蘇研究》2卷9、10期），實際上是描述清代268年詞派之流變的。文中談到浙派發端於曹溶，樹立於朱彝尊，繼之者有李良年、李符、厲鶚等，這些實無新見可言，但他說朱氏詞：「出筆凝重，灑落有致」，厲鶚詞有「清空峭拔的神韻」，還是很有見地的。至於敘述常州派之源流，也是通行的看法。但指出張惠言詞，不脫經師本色，「大雅逾逸，彷彿北宋」，有時過求精密，反倒落得板滯之弊。周濟的詞「綿密純正」，均爲有識之見。最後，詳述道咸以後的江浙詞壇之盛況：「文苑鼎盛，詞家也多起來，只是囿於常、浙兩派，食而不化的很多。這時江陰蔣春霖、吳縣戈載、

43 王洪佳，〈清代詞學〉，《女師院期刊》，第4卷第12期（1936年6月），頁9。

44 葉恭綽，〈全清詞鈔序〉，《全清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

丹徒莊棫、仁和譚仲修，比較能卓然自樹，有獨創性的。……後來，歸安朱孝臧、嘉興沈曾植，作詞宗尚，都和莊、譚有些淵源，換言之，就是承常州派相沿而來的。」所敘基本符合事實，但沒有提出什麼比較有發明的新見。

劉宣閣〈浙派詞與常州派詞〉一文（《微音月刊》2卷2期），分「他們的歷史」和「作風的差別」兩部分。在歷史部分，先是介紹清初的詞派，宗豪放者為陳維崧，宗婉約者為朱彝尊，然後，指出這二派演進為浙派與常州派，厲鶚與張惠言分別是其「權威」。在作風的差別部分，他從淵源、材料及修辭三個方面比較了兩派創作的差異：「從淵源方面說，浙派是宗南宋，常州派是宗北宋，浙派是宗姜（白石）、張（玉田），常州派是宗周（清真）、秦（少遊）。從材料方面說，浙派要意思曲折、佈局綿密，常州派主張『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周止庵語）從修辭方面說，浙派注重字句的精練，常州派注重字句的雅正。所以，從氣體方面立論，浙派的詞，以清空見長；常州派的詞，以逾逸見長。」分析兩派詞著墨不多，有些看法還是通行的看法，但通過比較，使讀者對浙、常兩派的創作特色有了清晰的認識，是一篇相對說來有深度的論文。

浙派是清初影響最大的詞派，曾經籠罩清代中葉詞壇達百年之久，對這個流派成員的構成及流變是大家所關注的。似慈說：

說起「浙派」，我們應該從曹潔躬講起……他看著清初人詞，各以明人為法，痛心詞學失傳，乃「崇爾雅，斥淫哇」，朱彝尊力倡其說，浙派於以形成。……與朱同時屬於浙派者，尚有李良年、沈皞日、李符、沈岸登、龔翔麟諸家。其後則有厲鶚、郭麐、王策、項鴻祚等，而厲樊榭尤為浙派的「白眉」，最為世所稱道，項鴻祚也是一個健將。⁴⁵

他敘述了浙派從曹溶—朱彝尊—厲鶚—郭麐—項鴻祚的發展過程，而此五人亦可以視之為浙派在不同階段的代表，惟其對中後期浙派成員的構成勾勒不是很明晰，倒是王易對這一點有比較清楚地敘述。他認為，浙派在朱

彝尊同時，除「浙西六家」，曹貞吉、徐鉉、嚴繩孫、錢芳標、丁澎、汪森「皆竹垞之儔也」。在厲鶚同時，尚有吳錫麒、王昶，在郭麐同時，則有吳枚庵。但是，將曹貞吉、徐鉉、嚴繩孫、錢芳標、丁澎歸之浙派，未免過於泛化了。曹貞吉風格上傾向豪放一路，徐鉉論詞亦不同意朱彝尊「詞則宜於燕嬉逸樂」之說。嚴繩孫為無錫人，詞風接近於顧貞觀；錢芳標為雲間人，為後期雲間派的代表；丁澎屬於西泠派，後期被流放塞外，詞多悲涼慷慨之音；王策為小山詞派代表作家，詞風近於五代北宋。這些作者都是不能簡單歸之於浙派的。龍榆生《中國韻文史》較之王易《詞曲史》晚出，對浙派成員及其流變的勾勒更為明晰，即浙派肇端於曹溶，樹立於朱彝尊，從而和之者為李良年、李符、厲鶚、張奕樞、吳翌鳳、郭麐等等，作者特地提到，項鴻祚作為浙派的後勁，其填詞具有幽豔哀斷的特點，其高處近於南宋，「非浙派之所能囿也」，這就把項鴻祚與浙派區別開來了。

關於浙派在轉變清初淫靡纖弱詞風方面所起的作用，多數學者都是認同的，但也嚴厲地指責其末流創作上表現出來的「餛釘」、「寒乞」之弊。如王洪佳說：

（浙派）其主旨，蓋承明詞之弊，而崇尚清靈，欲以救暉緩之病，洗淫曼之陋也。……挽明人之衰弊，接南宋正宗派之續，為清代詞學創立門戶也。若朱、厲等大家，其才情足以副之，故能有得於白石、梅溪，其末流則為餛釘為寒乞矣，其弊在於未能稍進於北宋，不能窺詞學之堂奧也，故不能深厚。⁴⁶

葉恭綽說：

順治和康熙初期，實沿明末餘習。雖其間雜以興亡離亂之感，情韻特深，才氣亦復橫溢，然其弊為纖仄與蕪濫。浙西一派出，救之以清雅，斂才就範。然其弊也，為餛釘與膚廓，且標舉南宋為宗，而其所重者，往往為琢句造詞，墮入宋人詞話所謂「詞眼」窠臼。猶之論唐詩的，僅知摘一、二佳句以為軌範，而對胸襟、意境、情感、氣韻、骨力，皆不注重。這如何可以論詩？自是以後，傳為衣鉢，僅

45 似慈，〈清代詞學略述〉，《申報》，1936年7月16日，頁21。

46 王洪佳，〈清代詞學〉，《女師院期刊》，第4卷第12期（1936年6月），頁7-8。

得糟粕、門面。降至乾隆中葉，頹靡更甚，一片荒蕪。⁴⁷

胡雲翼說：

最初的清詞還是繼續明代的詞風，尊奉《花間》、《草堂》為作詞的聖經。至朱彝尊改宗南宋，作風始變，後來便造成所謂「浙派」的詞。……屬於浙派的詞人，有李良年、沈暉日、李符、沈岸登、龔翔麟諸家，其後又有厲鶚、郭麐、王策、項鴻祚等。……（這些人）都可借陷溺於南宋姜、張一派太深，雖有富麗的才華，不能作充分的開展，故造詣不甚崇高。⁴⁸

不管是「體制外派」還是「體制內派」，對「浙派」的批評是一致的，但他們批評的立場卻是迥異的。「體制內派」大多是近代臨桂派的傳人，對浙派的批評是站在常州派立場看浙派，說浙派的創作「餽釘」、「寒乞」；而「體制外派」大多是新文化運動的追隨者，對浙派的批評是從新舊文化對立角度看浙派的，故而說浙派的創作是類比宋人，缺乏個性，毫無生氣。

常州派是代浙派而起的詞派，對晚近詞壇風氣的轉變有很大的影響，「體制外派」和「體制內派」對它的評價差距是很大的。體制外派以胡雲翼、趙景深為代表，胡雲翼認為：「大抵張惠言、周濟一般人，對於詞的研究是很深的，詞的見地也往往很高，但創作的才氣不大，所作詞大都失之凡庸，故譚獻稱之為學人之詞。」⁴⁹胡雲翼還只談到常州派創作之不足，趙景深則連常州派的理論都否定了。他說：「常州派的主張，在張惠言的《詞選序》裏顯示出來。……他主張重意內言外，主張要有寄託，於是，跌蕩靡麗的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之倫便一首也不入選，而那位士行塵雜的溫庭筠便被尊重，那些專寫婦人服飾的《菩薩蠻》，

『照花』四句也就有了《離騷》『初服』之意……他們想把詞也捧成正統文學，所以有這些忠君愛國的鬼話，不知他們自為漢人，卻做異族的奴隸，還比什麼屈原，豈不可笑！」⁵⁰語氣幾近嘲諷，可以說，對常州派的否定已至極點。「體制內派」以龍榆生、葉恭綽、黃孝紓等為代表，龍榆生撰有〈論常州詞派〉、〈晚近詞風之轉變〉、〈清末四大詞人〉等論文，《中國韻文史》也辟有專章論述常州派之興起與道咸以來之詞風，指出常州詞派興起的原因是：「詞至清代，原已發露無遺；得惠言而其體遂尊，學者競尚比興，另開塗術，因得重放光明，此常州詞派之所以盛極一時，而競奪浙派之席。」⁵¹對常州詞派及其追隨者予以極高的評價，葉恭綽、黃孝紓也在不同場合對常州派的歷史功績給予表彰。如葉恭綽說：「乾嘉以還，張惠言、周濟、龔自珍等創意內言外之旨，力尊詞體，探源《詩》、《騷》，推崇比興，於是，論詞者漸明詩和詞係一貫的東西，無所謂『詩餘』……詞之領域愈廓，包孕亦愈宏深，其所見，殆出宋之人上矣。」⁵²黃孝紓亦說：「迨陽湖張學文輩崛起於乾、嘉，標舉意內言外之旨，一洗側豔餽釘故習，益知詞學托體之尊。」⁵³表彰常州派之業績者尚有曾毅和張振庸，如張氏認為，二張詞「沈鬱疏快，悱惻纏綿」；其友人惲敬、左輔、丁履恒等「要皆一時作者」，周濟「恪守張氏之旨趣，為詞純正雅疏邈，足以比肩茗柯。」⁵⁴

客觀而論，「體制內派」之褒揚太多溢美之辭，「體制外派」之貶抑也顯得過於偏激，到40年代許多研究者包括文學史寫作對之多取「執中」態度。如王洪佳說：「常州派矯浙派之貌，襲南宋之習，而進宗北宋也。是以蔓衍嚶緩之病，一時作者，皆盡除之。然比興寄託，亦不能無流弊也。常州派之作者，往往流為平鈍

47 葉恭綽，〈全清詞鈔序〉，《全清詞鈔》，頁1。

48 胡雲翼，《新著中國文學史》，頁269-270。

49 胡雲翼，《新著中國文學史》，頁272-273。

50 趙景深，《中國文學史新編》（上海：北新書局，1947年），頁328-329。

51 龍榆生，《中國韻文史》，頁150。

52 葉恭綽，〈全清詞鈔序〉，《全清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

53 黃孝紓，〈清名家詞序〉，《清名家詞》（上海：上海書店，1985年影印本），頁1。

54 張振庸，《中國文學史》（上海：泰東書局，1936年），頁238。

廓落，反失浙派婉約清超之境。……蓋刻意求寄託，反失其自然之旨也。」⁵⁵ 劉大杰也說：「他（張惠言）的理論，詞必比興寄託為主，而又有溫柔敦厚的感情，要提高詞格，以防淫濫之失。在當日浙派盛極一時之詞壇，張說自能一新耳目。……張惠言所作不多，創作態度亦甚嚴肅，格調高人一等。但其追隨者，如董士錫、周濟鼓吹寄託，對吳文英、王沂孫諸家詩謎般的詠物詞大加讚歎，在碧山、夢窗中尋求微言大義則實在可笑，結果是在創作上陷入擬古之病，詞旨隱晦，莫知所云，幾成爲詩謎了。」⁵⁶ 這應該是科學的事實求是的態度，也是從事學術研究者所當取的態度。

附錄：1930-1949年清詞總體研究論著目錄

1. 王煜，《清十一家詞鈔》，南京：正中書局1931年。
2. 龍沐勛，〈清季四大詞人〉，《暨大文學院集刊》1卷，1931年1月。
3. 佚名，〈清詞拾遺〉，北平《晨報》（藝圃），1931年5月6-9日。
4. 任三北，〈常州詞派之流變與是非〉，《清華中國文學會月刊》1卷3期，1931年6月。
5. 劉宣閣，〈浙派詞與常州派詞〉，《微音月刊》2卷2期，1932年。
6. 劉樊，〈清末四大詞人〉，《國立武漢大學四川同學會會刊》1卷2期，1935年。
7. 葉恭綽，〈清名家詞序〉，《詞學季刊》3卷2號，1936年6月。
8. 王洪佳，〈清代詞學〉，《女師學院期刊》4卷1-2期，1936年6月。
9. 似慈，〈清代詞學略述〉，《申報》，1936年7月16日。
10. 郭則澐，〈清詞玉屑〉，民國25年閩侯郭氏蜃園校刊本。
11. 陳乃乾，〈清名家詞〉，上海：開明書店，1937年。
12. 陸樹柵，〈道咸以來的江浙詞風〉，《江蘇研究》2卷9期，1936年10月。
13. 龍沐勛，〈晚近詞風之轉變〉，《同聲月刊》1卷3期，1941年2月20日。
14. 夏緯明，〈清季詞家述聞〉，《同聲月刊》1卷7號，1941年6月。
15. [日]今關天彭，〈清代及現代之詞界〉，《同聲月刊》1卷7號，1941年6月。
16. 覺諦山人，〈清詞壇點將錄〉，《同聲月刊》1卷9號，1941年8月。
17. 龍沐勛，〈論常州詞派〉，《同聲月刊》1卷10號，1941年9月。
18. 吳征鑄，〈晚清史詞〉，《斯文》半月刊2卷7期，1942年3月16日。
19. 世連，〈近代詞壇復興之原因及檢討〉，《新民報》（北平），1942年9月27日。
20. 胡雲翼，《清代詞選》，上海：文力出版社，1946年。

55 王洪佳，〈清代詞學〉，《女師院期刊》，第4卷第12期（1936年6月），頁8。

56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達史》，頁1044。